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2.1

阶级重现

Göran Therborn

Komtar的(非)公民

Aya Fabros

秩序中的混乱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 > 英语与社会科学的霸权
- > 秘魯與罗马尼亚的社会学
- > 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
- > 历史一隅：不平等的女人参与
- > 人权：南高加索的父权
- > 公共社会学：人文社会科学新宪章
- > ISA: 社会学新鲜人
- > Women' s Worlds
- > 巴西社会学会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一期 / 2011.9

GDN



> 主编的话

当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利比亚的社会瓦解了，我所有的思绪开始转移到关注到底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仅是关注利比亚而已，还包括其他阿拉伯国家。动乱似乎蔓延到全世界了，因此，在这期通讯中，Göran Therborn以全球的角度去诊断不平等问题，并宣称阶级政治将重新来临。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分析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暴动事件。Aya Fabros刻画了在马来西亚的亚洲移工的面貌。Gohar Shahnazaryan分析后苏维埃社会中、战争频仍的南高加索地区的女权运动所面临的挑战。若要谈本期有什么核心主题的话，那我会以indignados这个字来涵盖本期的内容。

全球对话继续全球社会学的相关辩论。Renato Ortiz检视了英语的霸权地位，Ari Sitas和Sarah Mosoetsa则描述了南非社会人文科学的新宪章。秘鲁的Nicolás Lynch Marian Preda和罗马尼亚的Liviu Chelcea则重新检视了社会学和过去威权政府统治的复杂关系。

Jennifer Platt描述ISA女性参与的历史。Elisa Reis和Ann Denis为大家报告两场生动的会议：巴西社会学会和Women's World；Emma Porio则以社会学新人为题撰文。此外，我们也为文悼念社会学家Ulf Himmelstrand。

起初，我们原本设想全球对话是一份软性的通讯刊物，但是现在看起来她更像是一份以社会学视野分析社会脉动的读物。我们出版了11种语言，编辑群来自全球各地，一同做出了贡献。此外，数字科技让昨日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像是跨洲对于执行委员的访问。请大家看看：<http://www.isa-sociology.org/journeys-through-sociology/>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 不平等与抗争	
阶级重现	3
Komtar的(非)公民	6
秩序中的混乱	9
> 全球社会学辩论	
英语与社会科学的霸权	11
> 各国的社会学	
罗马尼亚社会学	12
秘鲁社会学的转向	13
> 纪念Ulf Himmelstrand	
奈及利亚社会学之父	16
来自前会长的吊唁	17
> 特集	
历史一隅：不平等的女人参与	8
人权：南高加索的父权	18
公共社会学：人文社会科学新宪章	20
> 會議與報告	
社会学新鲜人	21
Women's Worlds	22
巴西社会学会	23

> 编辑委员

主编：Michael Burawoy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òl

副主编：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enez, Habibur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印度：Ishwar Modi, Rajee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日本：芝 真里, 塩谷芳也, 姬野宏辅, 高见具広, 速水奈名子, 岩馆豊, 池田和弘

西班牙：Gisela Redondo

台湾：何经懋

伊朗：Reyhaneh Javadi, Saghar Bozorgi, Mitra Daneshvar, Shahrhad Shahvand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oforova, Asja Voronkova

媒体顾问：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全球不平等： 阶级重现

by Göran Therbor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英国, Linnaeus University, 瑞典, 横滨世界大会计划委员



前总统 Mbeki 看着 Johannesburg 急速报增的贫穷阶级。

过去二十年来，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处境似乎并不太差。中国、印度、东南亚等被国际经济组织称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就快速的成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上个世纪末的发展状况相当不幸，但是从2001年开始，他们的成长速度已经比全世界还快，超越了那些已开发国家。拉丁美洲和中东也分别在2003年和2000年后迅速发展起来。除了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其他新兴的发展经济体也安然度过由Anglo-Saxon银行家所搞出的金融危机。

> 民族与阶级

我们正在历经一个历史转向，这个转向不只是地缘政治的，也和不平等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发展不均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人类不平等与否，和住在哪里是密切相关的。在公元2000年之前，我们估计出有80%的家户所得不平等是因为国家不同而导致(Milanovic 2011: 112)。然而现在事情不同了，整体说来，全球的不平等趋势有所减缓，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停止拉大了，但是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却正在恶化之中。这也正好驳斥了“全球化”理论或是“科技变迁”的决定论。

上述现象导致了阶级的重现。这是一个对于全球不平等来说越来越有决定性力量的因素。阶级向来就非常重要，只不过在20世纪，虽然说有“无产阶级世界主义”，但是民族国家内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大过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隔阂。现在，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阶级之间却越来越分殊。

全球财富分配的阶级面向在1990年代愈益重要。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不平等急速恶化的年代，因为其比苏联更靠近资本主义。而同时印度则较为倾向均等化，但是也造成乡村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墨西哥和阿根廷则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一份IMF (2007: 37)的报告指出：世界上在90年代财富有增加的人，是不论在富裕国家或贫

>>

穷国家之中的前5分之1人口，其他5分之4都没有。

其实，有最明显变化的是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前百分之1的人和其余的人、前0.1%或0.01%和其余的人之间，差距明显扩大。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最近就指出(Vanity Fair May 2011)：美国最富裕的前1%人拥有全国40%的财富、拥有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总收入、也几乎都是国会议员。上个世纪末，前1%人的有钱人也不过才拥有了15%的收入，而印度则是9-11% (Banerjee and Piketty 2003)。

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不平等趋势在新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美国也是如此(Luo and Zhu 2008; Kochanowicz et al. 2008; Datt and Ravallion 2009)。例如，印度快速的经济成长并不会为最贫穷的那百分之5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在印度仍然有3分之2的女性体重过轻，而且她们一生皆如此。1995年就是这个情况了，2009年还是一样，没有改变(UN 2011: 14)。2000年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成长并没有解决贫穷问题。全世界营养不良的人口从6.18亿增加到6.37亿，占全球人口的16% (UN 2011: 11)。粮食价格也持续飙涨。另一方面，富比士杂志在2011年3月庆祝他们缔造了两项新纪录：在所列出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人数达到1210人，总财富4.5兆，比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GDP还多。这些人之中，413人是美国人，115人是中国人，101人俄罗斯人。

然而，不论在经济或是技术上，不平等的持续恶化现象似乎无法避免。在世界上经济不平等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中，只有拉丁美洲是唯一不平等有减缓趋势的地区(CEPAL 2010; UNDP 2010)，这是因为有很大的政治因素(Cornia and Marorano 2010)，对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军事独裁实施之新自由主义有着强烈的反感，此外，多少也和民主化的进程有关。在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重分配政策之所以可以实行，也是因为之前富人独占了所有财富。这表示出了阶级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比较国家之间的阶级关系的方法是看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这个指标包括了收入、生活期望、教育等。这个指标的计算很复杂，误差边际很大，不过，这对于了解全球的不平等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例如，最贫穷的1/5美国人，其指标比在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尼加拉瓜的富人还低，也低于巴西和秘鲁的后40%的人，和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巴拉圭差不多(Grimm et al. 2009, Table 1.)。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除了财富集中这个理由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会使得阶级重现。种族主义和性别偏见，或许在许多地方仍然可见，但是已经没那么明显了。明显的例子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已经减少许多。南非是一个很好用来解释制度化种族主义后所造成的阶级不平的例子。勇敢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 (2008: Table 3)等人指出：全球1990-2000年，家户所得的基尼系数大约是65-70，但是在2005年约翰内斯堡却是75！这是以消费支出来计算的，而这种方法通常比以收入来计算的方式还要来得会低估不平等的现象(UN Habitat 2008: 72)。尽管有边际误差，但是若要说，约翰内斯堡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不平等现象和全球的情况类似，这并不为过。

>阶级政治的四条途径

阶级最有可能以至少两种方式复苏。这两种方式差异很大，分别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种方向。而这两种又分别有两种变化。第一，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宰制力量的中产阶级有可能构成全球的中产阶级，占据世界上的财富，像是买车子，买房子，买电子消费用品，以及出国旅行。虽然这些全球性的高级消费会给具有环境意识的人带来困扰，不过那些商业人士和商业机构却是垂涎欲滴。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对于商业利润而言有着很大的益处。这些商业目标并非不可能，但是他们却低估了目前经济隔离和排他所可能带来的社会爆炸性。

第二，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使得前者在消费之前会先进入政治场域。最近几年我们在欧洲已经看见一些端倪(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发动革命)，至少，这在1848年之后仍未发生。许多中产阶级在社会经济上已经做出反击，像是反对智利的Allenda和委内瑞拉的Chavez，或是最近美国的Tea Party。和自由派的神话相反，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并没有什么民主的动机，泰国2008的黄衫军，以及在智利和委内瑞拉等地都可见这个现象。

然而，其他的中产阶级却敌视寡占、裙带资本主义和寡头政治。在乌克兰的橘色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2011年春天的阿拉伯革命也包括了为数可观且重要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排他性、独后有前人的体制，可能会引起愤怒的中产阶级进入政治场域，并带来改变。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向是来自工人阶级。历史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伴随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出现，这由马克思在19世纪中预测的一样。欧洲和北美现在正去工业化之中，财务资本主义正在公部门快速成长，工人阶级被分化、打败、士气低落。经济分配的极化以及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增加，在北大西洋地区造成了阶级政治的复苏。

工人阶级的重现也在中国发生。在这个全世界的制造工厂之中，工人来自不同的省份地区，被户口制度给限制住。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使得工人更加壮大(Pun Ngai in Global Dialogue 1.5)，而中国政府的官方仍声称是社会主义。所有人都在猜测其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分配冲突、迁徙、移民仍是老样子。

第四条路，则是必须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的不同和动态中找出规律。由于识字率的提升、通讯的新方法，社会运动面临到了很大的阻碍：族群、宗教、正式与非正式雇用关系，以及活动的分散，例如像是血汗工厂。可是社运组织、动员、集结的障碍并非无法克服。印度有越来越多的自我雇用现象、泰国的红衫军运动成为了2011年大选的一股重要政治势力。而人民阶级已经帮助诞生了中间偏左的政府，像是在巴西或其他拉美国家。

这四条道路的每一条，都非常具有社会学得意涵。全球中产阶级消费主义、中产阶级政治反抗、工业阶级斗争等等，另外还有阶级妥协，欧洲、中国、东亚跑走了

>>>

，而且最后产生了异质的大众阶级动员(Cf. Enrique de la Garza and Edward Webster in *Global Dialogue* 1.5)。将来最有可能的现象就是这四条路都可以大步向前的。反而相对的重要性不只是很难预测，而且在衡量数据证据和评价意义上都争议。

然而，民族国家制度还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组织模式，而且阶级冲突仍然发生在国家内部。新的全球不平等转向，就意味着，在人类的生活中，阶级将会重现，国家将会没落。

References

Banerjee, A., and Piketty, T. 2003. "Top Indian Incomes, 1956-2000", B R E A D working paper, <http://ipl.econ.duke.edu/bread/papers.htm>.

CEPAL, 2010. *La hora de la igualdad*.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Cornia, G.A., and Martorano, B. 2010. *Policies for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last decade*. UNICEF Policy and Practice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CEF.

Datt, G., and Ravallion, M. 2009. "Has India's Economic Growth Become More Pro-Poor in the Wake of Economic Reform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103, www.worldbank.org/.

Grimm, M. et al. 2009. "Inequality in Huma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32 Countries",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Working Paper 519, www.lisproject.org/publications/wpapers.

IMF 200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7. www.imf.org

Kochanowicz, J., et al. 2008. "Intra-Provincial Inequal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Warsaw, Working Paper no. 10/2008. www.wne.uw.edu.pl

Luo Xubei and Zhu Nong 2008.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700. www.worldbank.org/

Milanovic, B. 2008. "Even Higher Global Inequality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8:2.

Milanovic, B. 2011.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New York, Basic Books.

UN 2011.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1*.

www.un.org/

UNDP 2010.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ww.undp.org

UN Habitat 2008. *The State of the World Cities 2008/9*. www.unhabitat.org/



> Komtar的(非)市民： 马来西亚的自主移民

by Aya Fabros,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菲律宾

在马来西亚檳城的Kompleks Tun Abdul Razak (KOMTAR)原本是一座衰败的建筑物，如今移民把它活络了起来。虽然外国观光客出入频繁，但它绝对不是典型的观光景点，用来提供你看一下全球城市的肮脏的一面。整齐的划分的空间让Komtar像是新加坡的Lucky Plaza或是香港的Victoria Park，反应出了移民工人

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当地讨生活，观察着跨国现象，体验着全球化。

除了名声远播之外，Komtar有其自己的秩序。政策的限制之下，移工群体自己分配自己的生活空间。在一楼的某些角落，尼泊尔的小贩卖部提供给尼泊尔人一处会面的场所，吃着咖哩和momos，喝着饮料，听着Kathmandu的

音乐。在主要的大楼里，二楼是缅甸区，三楼是印度尼西亚，四楼则是菲律宾。

每个群体都知道其他群体位于什么地方，所以存在着一种未被言明的秩序，一种亚洲的系统化混杂。在那边可以找到batik和bagoong，还有缅甸的出版品和翁山苏姬的新闻。虽然有些地方没有被承认，像是中国城和小印度



Komtar曾经是檳城最主要的购物中心，虽然现在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但是仍然还是地标。因为座落于市中心，又是最高的大楼，所以其现在是檳城全球化大厦，是一栋移民据会得开放空间。

，不过，当你走进去绕一绕，会发现那个地方不只是区域性的，还是跨国的。跨越疆界藩篱的社会互动相当平常。这就是最素朴的全球化。

在马来西亚，估计约有4分之1的工人是pekerja asing (移工)，在工厂、农场、服务业里工作。尽管人数众多，马来西亚也需要他们，但是移工仍然不被重视，甚至被忽略。他们仅仅是过客，仅仅是临时工，雇主可以有权决定他们何时要被遣返回国或是可以留下。一位工人就这样观察到：“他们可以全权掌握工人的命运，凭他们高兴去挑选或是解雇我们。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能挑选雇主，甚至有问题的想离开时也不能离开。”

当工人承认他们到马来西亚是去工作的同时，他们也说他们并没有自由(parang walang laya)，像是古时候的奴隶一样。大老远跑来找工作，一到就被限制了人身和移动的自由。他们要被限制在工作场所和居住地，被孤立起来，高度依赖雇主和中介，但是这些人却会任意的没收工人的护照，用遣返去威胁他们。以恫吓、绝望、孤立去使他们顺服。结果，移工发现，来工作之后并没有比较有保障，反而处于更危险的状态之中。

在Komtar的移工要全力与这些束缚限制搏斗，并且试图找回自己的公民身份和能动性。在此，他们不再只是被剥去认同的工人，不再只是在生产在线、商店里面或是帮佣的劳动身体，他们不是其他人的附属物，也不是什么非法的佣人，而是一个个具有清晰脸孔的菲律宾人、缅甸人、尼泊尔人。他们也是消费者，有购物的自由，并把辛苦挣来的钱寄回家乡。他们也需要和朋友相互安慰和鼓励，交换意见，聊聊每天的工作以及自己国家的总总。他们也会上教会、参加聚会，办活动，张贴讯息、更新信息等等，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区。

移工无可选择地在他们也未必喜欢的地方住下，却被认为是“危险且肮脏”的。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在他们的空间，过他们的生活。可是还是会被例行性的突击检查、警察临检以及监控所干扰。然而，商家赋予这个空间新的意义，强调商业的重要性，否则，“你要他们到哪里去呢？”

走下楼，在一间咖啡厅里面，两个年轻人相互打比较了一下彼此刚从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拿到的卡，等待其他同伴载他们到Alor Star去探视被居留在那边的亲戚和朋友；走上楼，会看到一张临时用来玩tongits游戏的桌子，在另一间房间，菲律宾人则唱着木匠兄妹的著名歌曲：Top of the World。

来Komtar的人总是随意驻足，有时也不一定买东西。一个菲律宾人说：“当你来到马来西亚，会觉得孤零一人，可是到了Komtar，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以这个意义来说，Komtar像是离乡背井知人的集散地。在这里，分散各地的工人可以一起见面。这里没有移工的集体意识，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伟大计划，有的只是彼此相互照应，一起填补那个由于被归类为非公民身份而产生的空白。在这里，从缅甸来的移工建立了“丧葬志工服务”、医疗支持，建立正式组织，因为已经有无数的个案显示他们没办法得到这些基本的服务。其他自愿性的组织则提供心理上的协助与帮忙，并同时一起举办社会文化活动。

Komtar仍然继续活跃着，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当他们在角落和罅隙之中享受着生活时，其实也表示出他们并不想要因此威胁到工作和居留权。他们不断透过象征性的存在和在地的深化，展现出他们居住在此的权利。这是世界上不平等分配下微不足道的议题

罢了，可是移工却是如履薄冰。现在每天的活动看上去似乎稀松平常，不过是一般经验的汇集和少数的扩大而已，不过却是真实地反抗着那些可能会孤立他们于无形的艰困环境。一旦这个小区生根下来，他们自己将会发现这样的空间会如何地演化，如何开展出深刻的社会团结。■

> 历史一隅：

不平等的女人参与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出版副會長

若翻阅我们刚出版的“2010 Directory of Members”会发现，RC32 (Women in Society)是最大的研究委员会，总共有291人。这当然显示出了女权运动的影响力，也彰显了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以下我们用简单的几个量化数据来观察ISA的这段历史与潮流。

在执行委员会里，1974年有第一位女性被选出，而她在1978被推选为副会长。之后又有2位女性加入，总共3人，这样的状况持续到1986年，才变成5人。她们之中的一位就是Margaret Archer，是第一位的女性会长(也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位)。1990年代后期，女性人数是7人(共21人)，其中一位是副会长。2000年则有8-10位女性(共22人)，其中2-4人担任过副会长。显然，ISA的这个趋势有朝着性别平等的方向迈进。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状况解读为是ISA的特色。这些女性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变迁，也因为这个脉络，她们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学者，并加入ISA。1976年的数据告诉我们：有22%的会员是女性，所以在执行委员会中有18%的代表，并不会太少。只是，她们就来自几个特定的国家，像是在1970年之前的女性都来自英国或东欧。这也说明了在社会学已经在各国制度化之后所反映出的各种不同国情。

然而，ISA内各种社会分类不平等的会员结构，影响并不是很大。每个RC在Research Council都有一位代表，这意味着若是女性都集中到某几个RC，那么代表就会减少。同样



Margaret Arche，第一位ISA女性会长，1986-1990

地，若是女性从少数的几个国家来，那么代表性也会降低，因为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代表。

多数的RC32成员都是女性。2010年的成员中，从名字来看，我可以辨识出的男性大概只有10人。但是在其他的委员会，像是RC16 (sociological theory, 257人)，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几个特色，像是选择不同的领域、和不同领域的关系等。这也应该有更多关于这段知识影响力的历史研究，因为在非性别的领域内，这仍然不太被重视。





| 倫敦陷入一片火海

> 秩序中的 混乱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aw School, 美国, ISA横滨世界大会计划委员

在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地方发生的暴动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绝非只是单独的个案。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项警讯。当代社会中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愤怒通常都潜藏在我们无法预料的社会表层底下，像是家庭、小区、组

织、和政治。一旦被一点点的小事件点燃，就如同星火燎原般的扩散开来。如此的愤怒有4个要素：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主义、个人和集体的商业化，化名为宽容的种族主义、以及被特权阶级掠夺的民主制度。每个要素都有内在

>>

的矛盾性，一旦矛盾重迭，意外就会爆发。

> 不平等和个人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不平等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是解药。富人阶级的浮夸炫耀成为一种成功社会人物的典范，并同时瞧不起穷人和一般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会那么穷困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会有这样的看法，完全是因为个人主义当道所致。而矛盾的是，个人主义却是某种平等乌托邦的要素之一，例如，希望每一个都平等地取消社会团结。这里的个体只有在平等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才会认为那是个社会问题。这时，他们称作这叫做不公平。

> 生活的商业化

消费社会意味着将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人与商品的关系。和满足需要不一样的是，消费商品形成了一种无止尽的个人投资，无论是否拥有商品，都是如此。大型购物中心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鬼魅般的存在，社会关系始于商品，也终于商品。资本，即使它也渴望积累，但却服从了市场商品的法则，认为

有些东西太过于平常(水、空气)和个人(隐私、政治信仰)，而不适合在市场上交易。在相信金钱是普遍的媒介，和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这两种信念之间的差距比你我期待中的还要小。权力让这两者相安无事。然后穷人相信他们也可以用金钱得到所有的东西，但却是以犯罪收场。

> 宽容的种族主义

英国的暴动事件从一开始就有种族主义的成份。相同的例子是1981年的动乱，以及2005年让巴黎和其他的法国城市震惊许久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社会殖民的体现。社会殖民总是发生在政治殖民之后。种族主义仅仅是原因之一，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都参与在这些动乱之中。可是这个因素很重要，因为它造成自尊的腐蚀，以及社会排除。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比匮乏还要严重。一个黑人青年天天都在经历被质疑和被忽视的经验。这样的被社会质疑是很恶毒的，加上官方对抗歧视政策的偏离，虚假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宽容的假象。一旦当大家忽视种族主义，那种种族主义下的受害者就被称

为种族主义者，然后再度被社会所敌视。

> 被掠夺的民主

在英国的动乱事件和被金融市场摧毁的福利体系之间，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呢？他们同时用不确定的结果在测试着民主的秩序。那些参与暴动的年轻人是罪犯没错，但是我现在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总理David Cameron所称的单纯简单的犯罪事件而已。我们正在面对的是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制度性暴力：他们可以极尽所能地替银行纾困，但是却一点也不替那些对未来绝望的年轻人想办法，不想昂贵的学费如何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这些年轻人完全被社会所遗弃，然后反公共性的政策造成了庞大的社会冷漠、愤怒、忽视、混乱、暴力、以及恐惧，明天之后，煽动者只会宣称他们所作所为和一切的暴力动乱无关。而真正的失序其实源自于掌权者。然后很快的他们就会学到教训，重新掌控政治。■

> 英语和 社会科学的 霸权

by Renato Ortiz,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巴西

英语是全球化的官方语言。我之所以说“官方”，是因为其他语言的存在构成了当今的情况：只有英语高高在上。在全球的语言商品市场上，英语是全球现代性的代表。那么，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有什么启示吗？

在此我想要避免在争辩之中常常出现的两个立场。第一，英语的垄断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因为我不认为帝国主义是理解当今全球化的适当概念；第二，国族认同使得每个国家认为只有自己的语言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像是Saussure说的，符号的武断和历史与疆界的脉络密不可分，没有任何语言优于任何其他语言，每种语言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掌握这个世界。

有一种最庸俗的论点是：英语是学术界的国际性语言(lingua franca)。但什么是lingua franca？它是一种没有暗示、极大化沟通效果的一种语言。在自然科学界或许存在，但是英语绝对不可能是社会科学中的lingua franca。这无关国族尊严，而关乎知识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透过语言而得以可能。使用

什么语言不可能无关紧要，而是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差别。让我举几个例子吧。自然科学的文本除了有特别的安排顺序之外，还有特别的叙述方式，总是以第三人称和普遍的角度来呈现研究结果。例如，生物学家会说：“辐射的确描绘出了3个长条”，或是“变异明显呈现出了自身的向心性”等等。动词时态是现在式，使用第三人称描述事物，没有科学家的影子。然而社会科学的文本不可能把作者去掉，这也是为什么C. Wright Mills会说社会科学是一种知识的技艺。作者可以是“我”或是“我们”，绝对不会是第三人。当我们用“我”或“我们”，就代表有中介者的存在。此外，翻译也是问题。这展现在不仅是词语之中，也在我们如何去找到两个语言中相互对等的概念。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之中，不同语言的知识传统是很重要的。像是“国族问题”不能被化约成“国族主义”，例如国族问题就是拉美政治脉络下有很特殊意义的一种用法，这个脉络包括了国族

认同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的建构、以及边缘现代性的困局等等。这个概念指出了我们一个整体的学术传统：从墨西哥壁画到巴西的现代性。国族问题只是一个拉美国家在寻找自身认同的历史的浓缩而已，和国族主义一点也不一样。

然而，尽管有些异议，但是英语在社会科学中的霸权地位仍屹立不摇。这里面有一种全球性的科学风格在支持巩固着英语的地位。例如，在使用数据库的时候就是如此。数据依赖于各种因素而存在，像是技术、成本、市场等。而组织一个文本或引用需要最小化或甚至隐藏语言的因素，好让数据库可以呈现最科学的样貌。科学信息院(Institute for Science Information)有4种不同的目录，每一种都经过不同语言的变更。在1980和1996在社会科学引用目录(SSCI)中，英语出版的文章占了85%到96%之多。若我们都认为引用是建立科学权威来说是必要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就指出了一种语言排除所造成的阶层化现象。选择以英语出版文章和书籍，以及建立数据库，这完全是市场考虑。最大的相关企业，如Reed Elsevier和Wolters Kluwer垄断了全球市场，是因为书籍流通太简单了。如此一来，武断的语言标准变成了科学活动的正当性。这个武断性也因为数字科技(PDF, 引用)翻译语言上的不均匀分配，而进一步被强化。在美国与英国，翻译作品市占率不到5%，但到了荷兰或是瑞典，数字就上升到25%，在希腊则是40%。换句话说，越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语言，就越少来自其他语言翻译成这种语言。

但若是英语不是社会科学

>>

的lingua franca，那么为什么称英语拥有宰制的地位呢？我的理解是因为英语的无所不在，所以可以成为具有指引知识辩论方向的全球性语言。指引的意思是去选择议题，使得其被更广泛地被看见。

易言之，英语有权力去设定知识活动的议程。此外，ISA的创始者Eugene Garfield在1970年说法国科学有弱点，

是因为用法文写作。这个论点把普遍等同于英文，特殊等同于其他任何语言。全球英语变成了普遍的英语。大家仿佛忘记了：世界主义不是全球化的属性，而且个别主义变成了在地的方言，也是当代全球化的定义的一部分。在全球现代性下，作为全球的地方性，它特别言之有理，也随处可见。■

> 罗马尼亚社会学

by Marian Preda and Liviu Chelce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罗马尼亚

若以Michael Burawoy将社会学分为专业、批判、政策、公共社会学的角度说来，罗马尼亚的社会学有很强的政策取向，并且其他三个面向也在进步当中。罗马尼亚在19世纪就开始教授社会学，在两次大战间逐步发展出Bucharest社会学派(跨学科、以民族志为主)。原本ISA世界大会要在Bucharest举行，但是二次大战开始之后就被取消了。1948年，社会学被禁止了，直到1966年才开放，可是，1977年又再度被列入黑名单。要等到1989年之后，许多学校的社会学系才又开始成立，此后，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拿到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过去20年来，罗马尼亚的社会学培育出了3位劳工部长，1位首相，2位国会发言人，以及多位议员和高阶的政治顾问。许多政治分析家、记者、民意调查公司、高阶主管都将社会学得专业知识应用到公共场域之中。不过，对于罗马尼亚如和与国际社会学展开对话的反思，只是最近不久的事情而已。在2010年于Gothenburg的世界大会召开之前，罗马尼亚的社会学鲜少参与类似的国际性会议。这也符合了以下的趋势：由SCImago所做的这份调查显示，罗马尼亚社会学在全球的贡献程度，由1996年0.02%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0.15%，2010年则是0.44%。(http://www.scimagojr.com/countrysearch.php?area=3300&country=RO&w=)

罗马尼亚社会学除了在国际性的社会学期刊偶有发表之外(像是Current Sociology和Social Forces)，在参与国际性的期刊的创立与审查工作。例如，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www.irsr.

eu)将要发表的特刊就是环境社会学、全球南方的物质文化和消费、社会经济、生活风格、旅游等，作者分别都是知名的社会学者，像是Jean-Claude Kaufmann, Michael Redclift, Zygmunt Bauman, 人类学家Richard Handler和Daniel Miller。

在2008年由许多位学者与非学院的人共同创立了一个新的专业组织，叫做“罗马尼亚社会学学会”(RSS) (<http://societateasociologilor.ro/en>)，迄今有超过400名会员。第一界大会于2010年在Cluj-Napoca召开，大会主题是“重现社会：新的风险与连带” (<http://cluj2010.wordpress.com/>)，近200人与会，热门议题包括迁徙、组织、都市、社会问题、政策、社会心理学，但是大家对于社会价值、调查方法与后社会主义转型等问题也相当感兴趣。

第二界大会名为“超越全球化？”将会在2012年6月举办，从2011年9月中开始邀稿(<http://www.societateasociologilor.ro/en/conferences/conference2012>)。这次会议将会对过去30年来社会学变迁的历史做出观察与反省。藉由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例如911事件和全球金融海啸)，我们将探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潮流是否会消逝与陨落。■

> 秘鲁社会学的转向

by Nicolás Lyn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前秘鲁教育部长

秘鲁的社会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专业学问。然而它还没有制度化，也未被受到重视。社会学在秘鲁的发展有4个阶段：关心社会议题、专业化、NGO里的退化、回到批判社会学。

> 社会关怀

秘鲁在世纪之交由于对于社会议题的关心，使得许多人展开了社会学知识上的反思。可是那个时候的文章都以诊断问题的形式出现，去诊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发展与转型的方向。在早期思想家已经开始去问关于秘鲁的宏大问题。这里面包括了支持寡头统治的保守右翼人士，也包括了激进的左翼，一起去形塑这段知识的历史。右翼包括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像是José de la Riva Agüero, Francisco García Calderón和Víctor Andrés Belaúnde；左翼则有Manuel González Prada,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和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在第一阶段里面，特别是1896年，社会学也出现在



|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4–1930.

大学的课程里面，例如the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的Department of Letters。作为课程的社会学相对较少去处理社会议题，不过它承袭了孔德和史宾赛的传统，试图以理论去解释社会的发展。有趣的是反而因此社会关怀和社会学有了一点交集。不过接下来社会关怀倒是主导了社会学得发展。

> 社会学的专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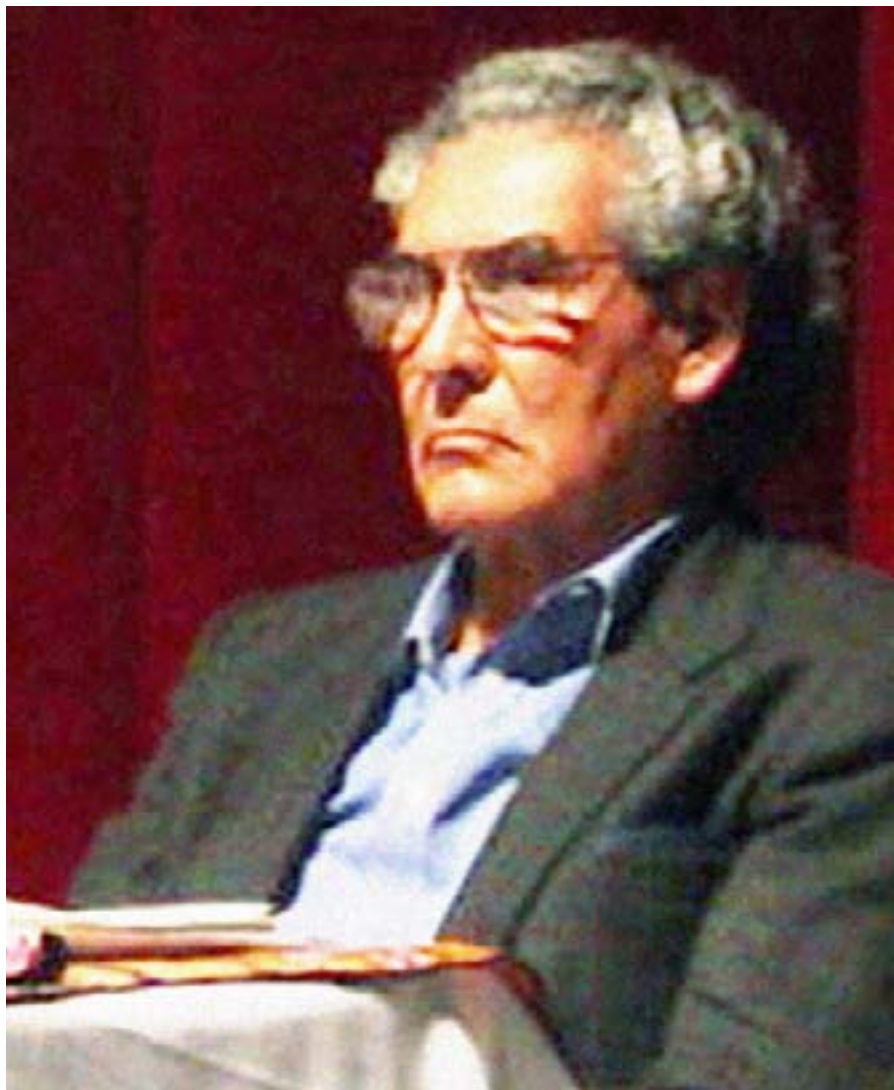
直到当代，1961年，随着University of San Marcos的建

立，秘鲁的社会学才成为专业学科。几年之后的1964年Pontific Catholic University也成立了社会科学院，包括了社会学。来自国外的支持和影响也很重要：University of San Marcos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金资助，Catholic University则有来自荷兰政府的援助。在一开始，结构功能论从美国引进，在研究和教学影响很深远。而技术层面则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

但是，这个着重在解决问题的社会学后来则透过学生运动、左翼在拉美得扩展，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上，产生了很批判性的思考转向。同时，民族主义、左翼政府的出现，军政府的政变，虽然产生了独裁统治，可是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学的职缺。1968年对于秘鲁来说意义重大，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个转变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面让社会学产生了革命性的认同，至少在新自由主义主在世界的1990年以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让技术官僚退位，把社

社会学当作是服务于革命社会转型的学科。1970年代新的方向和劳动市场把秘鲁的社会学带到的巅峰。同时不仅仅各大学设立了社会系，社会学者还到政府机构里任职，协助军政的改革。这段期间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性的社会转变。社会学研究因此有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关于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上。社会学作为专业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的氛围。

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不仅仅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还带进了20世纪初期社会学进步的先驱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的作品。围绕在此有个重要的争辩，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是César Germaná和阿根廷社会学家José Aricó。他们不仅是社会学家，还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可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所进展，不过还是有所局限。特别是在由Aníbal Quijano主导的期刊Sociedad y Política (Society and Politics)上对于军政府1970年代作为的分析中可以清楚看见这点。期刊El Zorro de Abajo (Zorro from Below)则由人类学家Carlos Iván Degregori主持，审查委员都几乎是社会学家，也在1980年代相当重要。Sinesio López是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编辑，他用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去分析国家展和社会运动。此外，Julio Cotler 则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的取径分析国家的形成，主要的一本书是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 Aníbal Quijano.

其在1978年出版后就再版了好几次。

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对于秘鲁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影响很大。教条马克思主义后来因为毛主义的共产运动的关系，被引进了秘鲁。教条马克思主义试图去重新建构社会科学，要所有的老师都关心政治，限制引用文献只能来自于苏联的科学院手册，里面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此时，政治上的暴力事件也在秘鲁发生了。毛主义团体Sendero Luminoso的叛乱导致了秘鲁12年的内战，大约7万人死亡，也让社会学死了。许多公立或私

立的大学废除了社会系，除了两个仍然有一定的水平而没有废除社会系的学校：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and the Catholic University。随着学科的瓦解，社会学家也面临到生存上的困难。

>NGO中社会学的退縮

在1980和1990年，非政府组织开始成为了社会学得避难场所。NGO之所以是避风港，是因为这个时候正值内战(1980)和Alberto Fujimori的独裁统治(1990)。那个时代社会学与左翼站在一起，甚

>>

至与革命为伍，相当仇视专业。对于社会学的需要一下子减少很多。也如同前述，许多社会学系被关掉了。因此NGO就成立了，多少是为了把社会学家聚集在一块，一起执行计划，获得国外的援助。这样的形式让很多社会学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发展其知识。结果就是让社会学家丧失了他们伟大的创意心灵，失去了更多的可能。从资金的来源就可以印证这点。多数的资金来自于世界银行，并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这样的霸权让批判社会学被“贱民化”(subalternization)。贫穷完全取代了不平等一词，这或许是解释这个现象的最佳脚注。

不过也有正面一点的消息。1990年College of Peruvian Sociologists成立，是一个社会学家的专业组织，变成为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的参考坐标。这个正在发展的组织已经把专业学者和应用学者聚集在一起讨社会议题了。

> 回归民主后的社会学

秘鲁在2000年重回民主的怀抱，同时拉美政治也左转，产生不小的冲击。社会学在拉美又开始蓬勃发展，可是在秘鲁并没有，因为秘鲁的民主政府并非左翼。在技术和批判社会学之间的紧张仍然继续着，也因此批判社会学仅限于少数的知识分子圈子。不过在学院，不论是硕士或是博士学位，都有新概

念被创出。然而像是1970年代社会学得发展一样，其实并不均匀。也有少数的论文是研究文化、都市、性别议题。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要被永远埋葬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个新典范诞生了，是由Aníbal Quijano从Immanuel Wallerstein那里得来，称为“权力殖民”。这个批判来自于José Carlos Mariátegui作品的延伸。Quijano认为秘鲁加入了由大都市为主的资本主义行列，谴责这些大城市的共谋地位。以民族国家的架构为主，国家并不能认同自己的民族人民，并且维持欧洲中心主义的演化论。这样的批判认为现代化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能带来发展。Quijano也提出了全球南方中地域的位置，也重申了在地人民的认同，建构出了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这点现在看来特别中肯，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除了Quijano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像是：César Germaná在方法论上的贡献；Sinesio López在政治学和公民身份上的专业；Gonzalo Portocarrero和Pedro Pablo Ccopa以教育和文化为主；Alberto Adrianzén对于拉美左转的分析。

> 结论

秘鲁社会学在学术和专业上的发展其实相当有限。主宰性的思想仍然在蕴酿之中。制度性的发展大部分是受到大学的影响，许多都还在导

论的阶段而已，至今还没有研究中心，也没有大型跨领域的计划。虽然如此，秘鲁社会学还是克服了许多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难关。通过这样的考验之后，让秘鲁社会更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就是现今她还是以批判社会的型态出现。若可以把握这一个浮现脉络的重要性，秘鲁社会学会就会找到自身的区域自主性，在文化和政治上有进步的转向。这需要新的发展和新的视野才得以可能实现。■

> 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 : 奈及利亚社会学之父

by Ayodele Samuel Jegede,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badan, 奈及利亚 · ISA会员



紀念Ulf Himmelstrand. Ayodele Samuel Jegede. 攝影

奈及利亚的社会学之父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于6月8号在他瑞典的家乡Uppsala过逝，享年87岁。Himmelstrand在印度出生，由于父亲职业的关系，虽然他有过瑞典的中学，但是他还是在印度那里度过大部份时间的童年生活。这也多少在两个国家都造成他一些边缘的位置。学术生涯的选择让他到了另一个国度，同时那边也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崩溃：发生于奈及利亚的Biafran War期间，同时期美国加州也爆发学生运动1960年代。这些经验都影响了他的社会学知识。

Himmelstrand的博士论文：Social pressures, attitudes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在1960年完成。在此之前他是University of Uppsala的讲师，之后成为助理教授(1960-1964)。之后则是University of Ibadan的教授及系主任。

直到奈及利亚在1960年独立以前，奈国的社会学的规模很小，也不过几门在University of Ibadan和University of Nigeria (Nsukka)的殖民社会人类学课程而已。在伟大的Kenneth Dike (University of Ibadan第一任副校长)的政策之下，University of Ibadan 晋身世界级大学，并将

社会人类学去殖民化，积极引入正统的社会学近来。Kenneth Dike和Rockefeller Foundation合作，聘用了一位40岁的瑞典社会学家为社会系的系主任，那就是Ulf Himmelstrand。

他在1964年8月到任以前，他把自己的专长区分为斯里兰卡和瑞典。到了University of Ibadan之后，他遇见了两位优秀的同事：Francis Olu Okediji和Albert Imohiosen。另外还有英国社会人类学家Ruth Murray以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Paul Hare。他接任Peter Lloyd的位子，并且在社会系从经济系独立出来之后，Peter Lloyd一直是社会系主任，并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传统。此外，Himmelstrand 的第一届博士生是Peter Ekeh和Stephen Imoagene (现在都是有名的教授了)。

Ulf Himmelstrand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念社会学。他把社会学去殖民化，引入主流知识，让奈及利亚的文化更加尊重这门学问。Ulf Himmelstrand在第一年带来了一个让该大学甚至兴奋的事情：一项国际计划以及经费。1965年夏天，社会系举办了一个讨论政治文化的国际会议，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

美国、拉美、欧洲、亚洲的社会学家，像是：Sidney Verba (Stanford University)和Robert Somm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奈及利亚的部份就是由Himmelstrand负责，同事也是该大学第一个大型的计划。其田野涵盖了1965-1967年各个地区的国家。很幸运的是，这样大型研究计划成了该系的传统，传承了下来。

现在很多知名的教授在以前都是他的学生。Peter Ekeh、Stephen Imoagene、Ekundayo Akeredolu-Ale、Samson Oke、Simi Afonja、Adesuwa Emovon、Martin Igbozurike、Layi Erinoshon等人是早期的学生。Adigun Agbaje和Eghosa Osaghae则是后来的学生，并合作写了Africa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1994)。

毫无疑问的是他对社会学的影响相当深远。他是ISA的会长(1978-82)，因为如此1978年在他的故乡Uppsala举办了ISA的世界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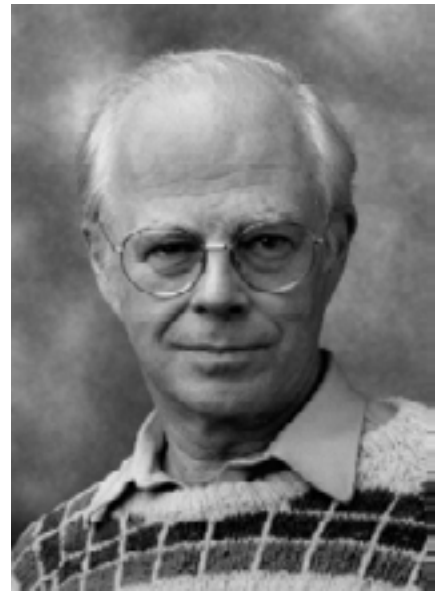
Himmelstrand是一位非洲主义者、理论家、某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专注在社会心理学得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相当有杰出的学者，春风化雨且影响深远。

1989年他成为University of Uppsala的荣誉退休教授。6月12日他长眠于家乡Uppsala，愿他永远安息。

> 遥想

Ulf Himmelstrand

by Margaret Arch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国, 前ISA会长(1986-1990)



| 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

2011年6月8日，国际社会学界失去了一位既是绅士也是伙伴的同事，他是 Ulf Himmelstrand。对他来说，“全球化”一词不仅仅只是个概念而已，他自己就生活在全球化之中。我想我们也不需要把他拿来和其他人比较，因为事实上，他在各方面的贡献是需要彼此串连起来才可以见全貌的。在他于1960年代担任系主任时最能证明这一点。他对奈及利亚和非洲的关怀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他的贡献也绝对不仅仅只是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去殖民化而已。他透过教学、研究、课程，为的就是去作这件事情：平等且认真的去作育英才，把社会学引进奈及利亚。Peter Ekeh已经在他写的的讣文之中清楚了表达了这点(The Guardian 26.06.2011)，并且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

他的这份对非洲人民的关怀是很有韧性的。当4分之1世纪过去，他在一次定期的回访之中被严重的袭击而受伤之后，他从未表现出自私和指责他人的态度，只有相当平静地描述他如何重新学习使用键盘、以便于可以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有一次，早在Roland Robertson发明“全球化”一词之前，Ulf就生活在全球化之中了：往返故乡Uppsala和Nigerian之间。相同地，作为ISA会长(1974-78)，他特别热心地在故乡举办了世界大会。他让这场会议别开生面，并且让瑞典和斯堪地那维亚地区见识到了何谓世界社会学。也因为他同时是理论家、功能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规划在会议上让大家激烈辩论Parsons和Poulantzas。这场会议没有和任何场次冲突，并且在一个很大但是有点远的地方

Aula展开。可惜的是，当数百人在雨中走到场地时，主持人大声地读了电报，说两位主角不克前来了。大家闻讯后，只好往回走，我记得我当时全身淋湿，并且很生气的发现后面居然还有一辆车跟踪我。事实上，这辆车是Ulf Himmelstrand的，他正在开着车沿路关心是否有其他的落汤鸡。

当他担任ISA的会长时(1978-82)，由于我负责出版的部份，所以在工作上往来频繁。常常执行委员会会因为一些辩论而延长。我的经验之中只有两位ISA会长可以用绅士的理性去导引潜在的爆炸性：Tom Bottomore and Ulf Himmelstrand。Ulf拥有很特别东西去帮忙他工作：在几天只有抽烟的日子里，Ulf会坐在一个特别的装置后面：由八根管子组成，我从来没有理解过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可以清理阻塞的器具(我还是没办法理解)，加上各种烟草罐。这些是舞台的道具，用来作某一种仪式的，根本和会议室没有关系。一个理性的人绝对会想要知道有必要用这么多器具和装置来获得心理的满足。不过，这一点也不是重点。当情绪到了临界点时，Ulf会很想要透过清理的管子去挖掘一些东西。这些年来我从来没听过他提高嗓子，也不曾听他说过仅仅不着痛痒的论点。他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Ulf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在工作上和生活生都是如此。有一次他在英国讲学，把脚踏车带来。然后就在离牛津大学不远的我家跟我打招呼。他从Open University骑脚踏车来，有60英里之远，还带了礼物来，是一本田园的英文诗集。当他来了一段时

间以后，我的两个小孩就会说：“Oolf”，“Oolf s back!”以朋友的角度来说，他总是不离不弃。他是在我于Madrid发表就职演说(1990)后第一个上前来看我的人，带来的不是华丽的赞美，而是深深地拥抱。我得到他对我新书的评论，而他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他也是少数几位会从头到尾把我的书看完的人。现在，他走了，离开我们，也留下了几分惋惜，因为我从来没机会告诉他我有多么重视他这位朋友。若这份短短的纪念大多着墨在他这个人，而不是他对社会学的伟大贡献。他的贡献当然让人望其项背，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之所以伟大，正式因为众人皆普遍认为他是是一位慷慨仁慈的人。



> 挑战南高加索的父权

by Gohar Shahnazaryan,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亚美尼亚



(在Yerevan的铲除施加于女性的暴力之抗议活动。Gohar Shahnazaryan摄)

1991年苏联政权垮台之后，开启了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女权运动的新挑战。有了国际组织和资金的援助，非政府的女权组织终于成立了。2003年我们集结了一群亚美尼亚的年轻女性，一起讨论在亚美尼亚，乔治亚，和亚赛拜然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办公室，所以我们都选择在首都Yerevan的都

市中心里一间叫做Artbridge的咖啡店里集会。在那一年之后我们就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当作办公室，为我们自己和其他被边缘化、无法发声的女性有个培力的场所。结果，这里就成了亚美尼亚赛在后苏联时代的第一间年轻女性的资源中心。那时是在Yerevan State University的校园里，随时开放。

可是很快之后官僚的大学就对我们处处限制，像是要求我们晚上6点离开，禁止我们讨论某些议题，例如性、健康的性，以及校园内的性骚扰。也因为如此，我们就被迫迁出校园，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叫做女性资源中心(www.womenofarmenia.org)。2006年起，我们就落脚在Yerevan，为各个年龄、教育程度

、性倾向、社会背景的女性服务。许多人因为透过每个月举办的女权教育训练课程而开始认识我们。在这个课程里，我们讨论性别歧视，父权、权力、暴力的共谋、性别建构的社会与文化基础。除了工作坊、课程和刊物之外，我们也试着去唤起年轻人对于类似议题的关心，去解除后共产时代大众对于公共参与的冷漠；所以，我们透过倡议、游行、展览、庆典等方式，试图动员人们对于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包括乔治亚、亚塞拜然，以及三个冲突的地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的性别议题的关注。总之，我们的活动都围绕在争议性和禁忌性的议题上，像是女人的性、贞操、性暴力等等。例如在2008年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叫做“Burying the Red Apple”，Red Apple是一种父权的仪式，目的在于控制女人的身体自主权和性，迄今在乡村还是可以见得到，用来象征年轻出嫁女性的处女之身。在这个仪式里面，新娘的家庭以及对方的家庭要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去探视新婚夫妇，以确定新娘是不是处女。若是的话，将会以得到一篮红苹果作为象征。我们现在以很和平的方式在关注女性的身份角色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1990年之后，这个地区发生了三起有关的暴力战争事件。很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势是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可言。可是，结果却是换来数以千计的女性，

包括难民，生活在忧郁和创伤症候群的阴影之中。因此我们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成立了分会，给予心理上的支持以及医疗上的建议。此外，我们也和商业组织合作，让这些女性可以有管道销售自己制作的东西。为了化解战争留下的敌对状态，我们也在伊斯坦堡和乔治亚等地举办活动，让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人可以一起见面。

我们今年和来自乔治亚和亚塞拜然的同事一起弄了一个Vagina Monologu的公共阅读活动。这个活动于2011年2月在Tbilisi (乔治亚首都)展开。起初我们其实很担心大众会不欢迎这样的活动，可是后来很惊讶的是反应都还不错，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都一起来聆听女人遭受暴力、歧视的故事。一位参与者就这么说道：“真不敢相信，在这里我听到了各种语言，也听到了各种和性、身体、生育、强暴、探索等等的故事，但是也都共享着一定程度的历史经验。仿佛就像大家的故事模糊了每一位参与着之间的国族疆界一样。”

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一项成就，就是成功起草了关于亚美尼亚性暴力的法案。现在该法案在议会中，我们希望可以在秋季的会期中通过。现行的法律对于性暴力或性攻击行为毫无规范能力。

不过我们还有重重障碍要克服，很大一个因素是由于我们总是以女性主义者自居，所以被人们以为是激进和挑战传统父

权的始作俑者。当其他人听到说亚美尼亚的女权运动不是来自于欧美、而是根植于自身早在6、7世纪就把性别平等写进法律之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之后，都大吃一惊。不过，敌意除了来自外界之外，女权运动内部也有紧张关系。很不幸的是在后共产主义世界里面，几乎每个地方的女权运动都被共产党内的女权运动者垄断了，这样一来的结果使得女权运动不断地再生产共产时代的父权遗绪以及威权领导方式，这抹煞掉了许多创意与自由。此外，老一辈和新生代的运动者之间对于什么是公民、草根、运动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的落差，老一辈的人现在多在NGO里面，而新生代的人多在较为平等民主的运动组织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继续强化我们的位置和自信，让年轻女性对于女人的权力和性别平等相关的议题可以有更多的参与和认识。■

> 勾勒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愿景： 来自南非的观点

by Ari Sita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前ISA副会长；Sarah Mosoetsa,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南非

南非高等教育部部长Blade Nzimande委托社会学家Ari Sitas和Sarah Mosoetsa规划和构想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全球对话希望我可以对这个大胆的愿景作个整理，介绍给大家。报告全文可见：www.charterforhumanities.co.za

当全世界的人文及社会学科都面临到发展的压力的时候，南非正在着手规划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宪章(HSS)，用意是想更活络既有的学科，为高等教育注入活力。我们在草拟这个新计划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重复已知的许多问题。我们不希望仅仅停留在对过去历史的修正上，亦即努力抹掉种族隔离的历史遗迹，而是还希望对未来的世界提供一个适合的发展蓝图。

当我们的国家第三级教育部门要求在教育之中踏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第一步时，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对于这样的要求要如何快速的做出回应。就如同Manuel Castells在“信息时代”(1998)第3册中所说的一样，“全球化的动态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了，把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人事物链接起来，开起了权力和财富的网络，从宰制阶级的利益而言，人民和领土仿佛一点也不相干”。

Castells所描绘的景象，对于那些仍然活在“第四世界”中、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显得相当恐怖。之前，南非的政治领导阶层对于完全陷入信息资本主义黑洞之中的想象，觉得难以置信。因此，必需要不计代价地避免这个悲惨命运，一点也不能妥协。对于那些呼吁要求要从非洲悲情主义中走出来的人士来说，作法就是我们自己解救自己。结果，政策上的响应就是优先发展科技，也就是让学术作为经济成长的基地。

HSS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相关

的学术成果被忽略，贡献也被边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在奖助政策上的偏见，并且逐步朝向John Higgins笔下所谓的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模型，好有利于研究成果的量产。这个模型并不知道什么是HSS。对于这个模型的批判相当有力，就像其他对于高等教育企业化的批评一样。当我们在和上千个大学院校、政府或社会上的利益团体接触过之后，我们深深确信：我们会是南非在追求和平、安全、幸福这条道路上，重要历史、遗产、与记忆的承载者。

在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思考之后，我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建言，主要有6项关键性的介入行动，并且在2的阶段中执行：第一阶段：2012 - 2011；第二阶段：2015 - 2018。

-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院/制度/组织的形成：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去活化研究活动，分别在5个主要学校中进行；第二阶段则是4所学校。这些学校必须在指定的行政区域。

- 非洲文艺复兴计划：这会是一个全非洲的计划，就像欧盟的Socrate和Erasmus Programs一样。

- 终身教育机会中心的建置：为了公平、保障就业与机会。

- 6项连锁计划的巩固：在第一阶段，会刺激HSS领域的发展。

- 新架构和规则的创立：这是为了学科整合的必要。

- 14项矫正介入行动的实践：在第一阶段执行，为了永远克服现

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既存的危机。

我们认为，若是上述的建议都能落实，那么，我们将可以预见在2030年，人文社会科学将会是非洲学术、教育、社会、责任的中心。

我们也可以预料到，我们的学院和制度在全球北方和南方将会拥有对等的伙伴，一起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传播贡献心力。我们也了解到教育和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所以也会提出建议，去让我们的系统可以在变迁中更加活跃。

总之，我们是要建立非洲的学术重镇、全球倡议的伙伴、以及进步与变迁的中心。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若是乐见这样一个全非洲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宪章的诞生，那将会是莫大的鼓舞。■

> ISA的社会学新鲜人¹

by Emma Pori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宾, ISA执行委员

在第17届世界大会于2010年召开之后，新任的会长Michael Burawoy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ISA的会学家新面孔(early career sociologists)。本篇就是对ISA学生会员所作之调查的初步报告，也是本委员会今年于墨西哥的执行委员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

数据源：本委员会的报告数据源如下：(1)对ISA学生会员所做的电子问卷(由ISA秘书处执行问卷调查，大约30%的问卷回收率)；(2)从2000年到2009年PhD Laboratory奖得主以及其后续的会员资格情况；(3)之前PhD Lab的纪录，以及青年社会学网络(JSN)的会员及非会员；(4)JSN的e-group；(5)PhD Lab负责人员；(6)JSN和ISA前后会长Michel Wieviorka和Michael Burawoy的对话。电子问卷以社会人口学得变项为主(年龄、性别、博士毕业年度、地址、研究所就读国家、大学毕业年度、就业状态等等)。

那么，谁是ISA的社会学新血轮呢？在5053位ISA会员中，830人(16%)是新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学生身份加入ISA，且多数正在工读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并且最多4年内可以拿到学位。若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有507位来自A类国家、245位来自B类国家，78位来自C类国家。

填答问卷的253位受访者中，138位女性(56%)，115位男性(45%)。大多数(80%)是博士生，其中有些人最近已经拿到博士学位(14%)及硕士学位(4%)。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只有1个人大学

生。此外，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国家念学位。有54%的博士生和78%已经取得学位的人回答已经拿到稳定的工作，而硕士的状况则只有50%。

ISA新会员的来源，最大宗是来自于PhD Lab (130人)或是得奖者，以及青年社会学家国际竞赛(World Competition for Junior Sociologist)的最后名单(约45人)。不过在130人的PhD Lab成员之中，只有半数64人曾经参加过ISA (2000-2009年)，而且仅仅34人在2010年11月继续会员资格。

在第16届世界大会上(Durban, 2006)，青年社会学家工作坊的参加者组成了青年社会学家网络(JSN)，从此之后，他们非常积极地举办活动，像是在2010年的世界大会和2008年Barcelona论坛都举办特别的场次。可是，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面临到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他们将会像他们的活动一样，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更整合到ISA之中。

本委员会基于问卷调查和对JSN的访谈，对ISA提供以下的建议：

1. 举办迎新，欢迎这些社会学新人。像是在2012 Buenos Aires论坛，或是2014横滨的世界大会。藉此他们可以和其他中生代或是年长的社会学者有交流见面的机会。
2. JSN所举办的活动应该被整合到ISA的例行事务之中。
3. 对于新人所办的生涯发展会议或工作坊(例如如何发表文章到期刊、如何撰写评论等等)也应该是ISA的例行全球事务。
4. ISA的领导阶层应该积极

鼓励研究委员会、主题工作组织、国家会学、以及其他团体会员，在所有ISA相关的场合，去支持这些社会学新鲜人。(从财务及会员委员会那边的资料得知，研究委员会和主题工作组织会优先给B类和C类国家的成员ISA会议的旅行奖助，特别是新人。)

5. 社会学家国际竞赛和PhD Lab的组织者应该多多鼓励成员加入ISA。
6. 参加任何ISA会议的社会学新鲜人，秘书处应该要密切关心，否则会失去联络。
7. ISA的组织章程应该修改，以强调招募社会学新鲜人至ISA的重要性。

1 我们用“社会学新鲜人”是因为有些人并非年轻人，但是却是这个领域的初生之犊。

¹我们用“社会学新鲜人”是因为有些人并非年轻人，但是却是这个领域的初生之犊。

> Women's Worlds

by Ann Denis,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President RC05, ISA前研究副会长

Women's Worlds是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会议，每3年举行一次，协办单位是Carleton University和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Université d'Ottawa)，并由 Université du Québec en Outaouais 和 St. Paul University所赞助支持。今年的会议于7月3-7日在Ottawa-Gatineau举行。有2000人注册，约800名到场，来自世界各地92个国家，非常具有国际性。会议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场次(每一天的三个时段都各有将近30个场次)。与会者有来自学术界的，也有来自于社运界，彼此交流对于女人的现身(或缺席)的多元观点。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绝佳的对话与学习的机会。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链接与对话。包容、排除、孤立：全球化时代的生活”。也因为如此，多元性和国际性是会议焦点。每天安排有一个主题，breaking cycles, breaking ceilings, breaking barriers, breaking ground。主题涵盖

从女性的挑战和限制，到女性的创造和包容，以及迈向更平等的未来。每个主题之下的场次包括了小额信贷、艾滋病、对女性的暴力、艺术等等。进行的方式除了以传统的报告之外，也有针对结构式主题的对话形式。有些主持人把讨论聚焦在参与者身上，有时则放在女人的自主性上。

今年Women's Worlds的一向特色是：会议以三种语言(英、法、西)进行。口译并不多，有些场次只有双语，若需要的话有非正式的口译；有些则只有一种语言。此外，大会也有考虑到行动或是其他方面不便的人士，提供口语或是轮椅。也特别为年轻女性和原住民着想。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会议的包容性和丰富性。最后要强调的是，本会议是一场国际性的，学界与行动界的对话与交流。

上述我都把焦点放在会议的形式和结构上，并未针对内容进行讨论，理由在于，我想呈现给大家当

时大会进行的整体氛围，而不是挑选几个特定主题介绍而已。

ISA的RC32成员：Women in Society一直是这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她们除了组织了RC32的brown bag lunch进行信息交流、在WW11 Bazaar上设立一个信息广告牌之外，RC32的主席Evie Tastsoglou也制作了一个Women in Society参与Women's Worlds的名单(现在在ISA的网站上)，方便大家跟各个成员联络，也藉此介绍RC32。

更多关于Women's Worlds的信息，像是影片、论坛、会议信息等，请到<http://www.womensworlds.ca>。下一届会议将在3年后(2014)举行。我想就如同我从1993年到现在共参与过4次的经验，下一次必定也是相当具有启发性与活力充沛的女人聚会！■

> 日益茁壮的巴西社会学

by Elisa P. Rei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前ISA执行委员



Curitiba的巴西社会学大会。Elisa Reis摄。

第15届巴西社会学(SBS)大会于2011年7月26-29日在Curitiba举行。约2000名社会学家在Paraná齐聚一堂。Paraná以其成功的创新都市计划文明。大会主题是“变迁、延续和社会学得挑战”，会长Celi Scalonu也持类似观点，他在演讲中说社会学是一门不断被自己的历史所挑战的学科。整个会议也邀请与会者把握这个机会，对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做出最好的判断，为将来的公共角色作准备。大会把各个会议主题做了很好的结合，让国内的社会学者和海外学者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主题演讲者给了我们很多元的想

象。Margaret Archer, Seyla Benhabib、Robert Mare、Tom Dwyer、Werneck Vianna、Maria Nazareth Wanderley等人也开启了许多有趣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Werneck Vianna是唯一二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发表了题为“社会、政治与法律”的演讲，讨论在巴西旧政府的法律制度与过程，以及迈向现代性的进程，还有民主经验。Maria Nazareth Wanderley。而另外一位得奖人则是以经济理论关系为题演说。这次大会包括了6场主题演讲，七个论坛，3个特别主题，31个圆桌会议，有超过32个研究团体参加

。不过最让人兴奋的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来，他们的热情和理念，大大刺激了会议的辩论。巴西社会学在1950年建立，迄今已走过很长了一段路。在政治大动荡之后，SBS再度充满活力，而那时正值刚开的民主化，尔后，会员人数就稳定成长。我是前SBS的秘书，见证了在1980之后巴西社会学的进步。从这次大会我们可以发现：巴西的社会学越来越繁荣，且学会会员也都清楚对国家的理念，和全世界的学者做出连结。■